

“中国近代史”学科史之一页：

郭廷以的早期学行及与罗家伦、蒋廷黻的交往

戴海斌

（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，上海，200235）

[摘要] 郭廷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驱人物之一，后出任台湾创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首任所长，卓有建树，可谓近代史研究承上启下的人物。郭廷以东南大学历史系出身的背景，以及与罗家伦、蒋廷黻等人的学术交往，深刻影响到他之于史学研究的理解和实践。不同于一般人所了解的那种刻板印象——一个会写史事日志的“史匠”，郭廷以重视中西“交通”的观念，全面渗入到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，而他强调“通识”的治史理念，也在民国史学界独树一帜。聚焦郭廷以早期研究活动，以及他与同时代研究者的学术交往，可由此为切入观察“中国近代史”作为一门“学科”成长的历史。

[关键词] 郭廷以 罗家伦 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

“中国近代史”作为一门“学科”的出现，是相当晚近的事情。一般认为大约要到上世纪30年代，“中国近代史”的概念才为人普遍接受。相比于古史领域一轮接一轮新旧相攻、激烈争辩的热闹场面，民国时期的近代史研究似乎就寂寞得多。今人言及研治近代史的民国学人，不过蒋廷黻、罗家伦、陈恭禄、郭廷以等寥寥数位。40年代以降，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，中国近代史研究地位陡升，成绩斐然，而治学旨趣已然转移。蒋、罗二位被公认为近代史研究奠基性人物，引领风气之先，令人遗憾的是，后均转投政界，无暇著述。为人所称道的蒋著《近代中国史》（后改名《中国近代史大纲》）初版于1938年，是他利用政治生涯空闲，在两个月时间内完成的，自定义不过是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”，而此后再无治学时间与精力，完成更具分量的研究了。陈恭禄的学术生命延续至新中国建立后，但格于环境，创造力已不复当年。他后来出版的史料学著述内容大多沿袭早期讲义，写于1963年的“序言”还特别加入若干理论性话语，强调“历史是党性极强的社会科学”，“史观统率史料是正确的看法”。¹

比较特殊的是郭廷以。他在1928年已创拟《近代中国史》19册这一规模宏大的写作计划，并有意与罗家伦、蒋廷黻合撰近代史以供一般阅读。从30年代开始，推出一系列以编年系事为特征的“史事日志”型著作。²更为人所知者，作为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，擘画创建，养成人才，使得一个新兴学术机构迅速成长为近代史研究重镇，乃至卓然而立、孕育出一享誉学界的“南港学派”。³纵观而论，郭廷以可谓中国近代史研究承上启下的人物。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《近代中国史纲》在香港出版后，即受到学术界和读者重视与欢迎，先后3版13次印刷，80年代又在台湾刊行，目前在大陆也已有两个版本。⁴有

¹ 陈恭禄：《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》，中华书局1982年，原序。

² 综计生平相关作品有《太平天国史事日志》二册、《太平天国历法考订》一册（南京：国立中央大学，1934年；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1946年）、《近代中国史事日志》二册（台北：商务印书馆，1963年）、《中华民国史事日志》四册（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1977—1985年）。

³ 参见陈三井编：《走过忧患的岁月——近史所的故事》，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1995年。

⁴ 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9年；上海：格致出版社、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9年。关于该书出版重印的说明，据格致版“出版说明”。

意思的是，像郭廷以这样影响一代风气的研究大家，在他弟子披露“台湾学界内情”的著述中，却被归入“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”行列，作为与“非主流”相对的“主流”，其一为科学主义史学派，二为马列主义史学派。⁵反观今日不同背景的史学史作者均热衷讨论的“史料”、“史观”两大学派或学术系谱中，也确难找见郭廷以其人的清晰身影。⁶由此带来的困惑，难免让人对这位史学家产生好奇。本文拟梳理郭廷以早期主要学术活动，并兼论其人与罗家伦、蒋廷黻的学术交往，尝试通过这样一位具有坐标性意义的人物，观察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一门“学科”的成长史。

一、学术起步

1904年郭廷以出生在河南舞阳一个小康的地主家庭。他是最早一批新式学堂的试验者，由初小而高小，在家乡读了十年书。一样先从《三字经》读起，又改念“字课图说”，认识“天运日月星”，蔡元培、张元济等人编写的国文课本，用浅近文言写成，他觉得“很有趣”，竟能从头到尾背下来，令父辈大感惊讶。民国初年，课文内容换成了“人手足刀尺”，再换成“大狗叫、小狗跳”一类，郭廷以不以此为满足，在父辈指导下修习《四书》及《论说文苑》、《论说入门》、《东莱博议》，作为国文课的补充教材。⁷以上这些构成了郭廷以早年教育的内容，也搭建了他知识结构最初框架。

1918年，郭廷以第一次走出家乡，考入开封第二中学。他喜欢看书，几乎所有商务新书都不放过，《新青年》、《每周评论》上那些“很具刺激性”的言论更是前所未见，他敏感地意识到“思想界仿佛在动了”。⁸五四前后，郭廷以以二中代表加入“开封学生联合会”，编辑学联周刊，并写了不少攻击安福系的文章，甚至因为领导学校风潮，不得不转学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，至1923年，又保送进入东南大学历史系。⁹

南京对于郭廷以来说，是一片新的天地。新文化运动后学界分化，以东大为中心的学人群体与北大新文化派遥相对应，隐然有双峰并峙之势。郭廷以体会东大精神就是“不走极端——承受我国固有文化，并且拼命吸收西洋文化”。据郭廷以自述，附中时期深受两位老师的影响。一位是哲学教授刘经庶¹⁰，提倡科学训练，强调数学素质及工具书的运用。数学的训练有助于养成严谨实证的习惯，而重视工具书对他后来编撰“史事日志”一类索引性质的著作或有所启发。另一位是国文历史教授柳诒徵¹¹，他对学生表示说：“不要受胡适影响不看旧书，要有本领把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都标点出来才好。”在他指导下，郭廷以阅读了不少旧籍，附中四年是他攻读古典最用力并确立旧学根底的时期。但毕竟是受五四风气熏陶的一代人，郭廷以在学时期也听梁启超和胡适的讲演，前者“渊博”、后者“条理”，都给他深刻印象；对柳诒徵的观点，他坦承并“不太同意”，而那些“较新的观点”有着更大的吸引力。柳当时讲授中国文化史，因材料问题不好解决，鸦片战争以降一段几乎无从讲起，授课主要

⁵ 王尔敏：《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》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7年，前言，第3页。

⁶ 许冠三：《新史学九十年》，香港：中文大学，1986年；王学典：《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》，济南：山东人民出版社，2002年。

⁷ 《郭廷以口述自传》，北京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36—37页。

⁸ 《郭廷以口述自传》，第63—64页。

⁹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，简称南高，前身为三江师范学堂，1915年正式开校，1921年筹改为东南大学，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。

¹⁰ 刘经庶（1885—1923），字伯明，江苏南京人。早年赴美留学，获哲学博士。回国后应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哲学讲座教授，出任国文史地学部主任。一度主持实际校务，为东南大学创建人之一。

¹¹ 柳诒徵（1879—1956），字翼谋，晚号劬堂，江苏镇江人。早年任南京江楚编译局编辑，相继执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、东南大学、中央大学，主持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，1948年获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。曾主编《学衡》、《史地学报》、《史学杂志》等刊物，著有《中国文化史》、《国史要义》等，在二、三十年代中国史坛，与北方任教的史家陈垣、陈寅恪并称“南柳北陈”。

参考日文著述，并要求学生对照《东华录》比读。这实际成为郭廷以接触近代史料的初步。他说，“初看茫无头绪，后来越看越有兴趣，从道光朝看到咸丰朝，再往前看看到乾隆朝，我另编出一套章节，很得柳先生赞许。”¹²

二、初识罗家伦

由东南大学最初两年，郭廷以渐渐摸到研究门径，但真正引领他进入近代史研究天地的，还是罗家伦。在他大三时，罗被聘入东大历史系，郭廷以回忆当时课堂情形：“由于罗先生名气大，讲话风趣，最初上课轰动一时，以风雨操场做教室，文科学生固然要听，其他科系学生也挤去听”。¹³罗家伦犀利的谈锋、崭新的观念，给他极大震撼，由此结下学术之缘。1927年郭廷以大学毕业，经罗家伦推荐，进入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工作，后又转入中央党务学校编译部。1928年，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，邀郭北上协助行政，二人在清华又有一段共事经历。郭以历史系教员名义与罗合作讲授“中国近代史”，负责主讲“鸦片战争”、“魏源的海防思想”、“洋务运动”等题目，这是他从事近代史教学之始。1930年离开清华后，相继执教于河南大学、中央政治学校，至1932年应罗之聘，回中央大学历史系任教，直到1949年。对两人间的关系，郭门弟子王聿均曾做这样的描述：“郭廷以先生和罗家伦先生的关系始于师生，后来又有同事之谊，再渐渐变成师友关系，到了晚年，尤其是到了台湾之后，两人完全是朋友关系了。”¹⁴

郭廷以本人坦承，在史学方面“影响我最大的是罗家伦先生”。而所谓“影响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注意外国资料，二是研究近代史。郭原对外国人写的中国史著作评价并不高，感觉“很肤浅”，而罗家伦推介当时最新出版的马士（H. B. Morse）《中国帝国对外关系史》，¹⁵他立即“花三十大洋从上海买来”，仔细阅读后，观感发生了变化：“许多材料是我过去所没看到的，见解也未可厚非，不可轻视，观念改变了，开始注意外国资料”。郭廷以对此书一直非常重视，他在南京和台湾不同时期的学生，都不约而同提及马士著作是课堂上为数不多的指定参考书目之一。¹⁶

罗家伦的影响还有另外一层，他特别强调英国，认为“近百年史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要研究英国”。郭廷以在东南大学时期完成的学业报告即以《英国在远东的发展》为名，在这篇他自称费时3个月、成10余万言的长篇报告中，主要讨论了英国早期在印度的经营，及如何利用印度进而发展至中国的过程。多年后，郭廷以在回忆这篇“少作”时，仍颇有自得的意味：“当时这报告轰动一时，直到现在基本观念还没有改变，而我由于写这报告接触近代史资料与后来我的研究近代史很有关系。”¹⁷郭廷以在大学时代的早期训练，基本奠定了他研究近代史的学术趣味和领域。我们可以发现，他到台湾后写作的几篇重要专题论文，无论论题和主旨仍在他早年研究的延长线上。¹⁸

¹² 《郭廷以口述自传》，第94页。

¹³ 《郭廷以口述自传》，第108页。

¹⁴ 《王聿均先生访问记录》，《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》，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04年，第4页。

¹⁵ 按，《中国帝国对外关系史》（*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*）第一卷出版于1910年，第二、三卷出版于1918年。

¹⁶ 《李恩涵先生访问记录》、《刘敬坤先生访问记录》，《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》，第215、461页。

¹⁷ 《郭廷以口述自传》，第109页。

¹⁸ 参看郭廷以：《近代中国的变局》，台北：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，1987年。

三、与蒋廷黻共事清华大学

郭廷以在清华只待了短短两年，有一个重大收获，就是结识了蒋廷黻。蒋由南开转赴清华任历史系主任，一般认为是罗家伦慧眼识人，这中间郭也发挥了作用。据其自述：

“罗先生请不到人，自己和我合开近代史，又请朱希祖来兼课。……我到清华后，发现一份《近代外交史辑要》，油印本，两百多页，没有印作者姓名，但觉得有头绪，有体系，我问刘崇鋐，他说：‘可能是蒋廷黻。’打听果然是他，我拿去对罗先生说：‘这个人很值得请。’罗先生立即写信请他，蒋大为高兴。”¹⁹

不管对行政任命发挥了多少影响，至少在学术层面，郭廷以流露出来对蒋的欣赏几无保留。蒋本人充分意识到清华对他个人的非凡意义：“清华五年实在是够刺激的，可以说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——中国近代史”。他回忆那段时间是他“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”，“我乘便可以接触故宫博物院的档案，有一段时间，我们有好些人在故宫博物院抄录档案，把未公布的重要文件抄录下来”。²⁰无独有偶，郭廷以在晚年接受访问时，也愉快地忆及与蒋结伴去故宫大高殿查大清实录的情形，谈到蒋前后数年“抄了两千件以上的文件”，欣赏他“有天份，名气渐渐高起来，居然在《独立评论》发表政论，有写作的方法，有见解”。²¹

众所周知，蒋廷黻最重要的史学成就《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》两卷（商务印书馆1930、1934年），都是在清华任教时期出版的。他不满足于此前“不分中外，几全以外国发表的文件为根据，专凭片面证据来撰外交史”的状况，将在海外学习的历史研究法具体运用到中文史料的搜集、判别、选编过程中，这样一种由基础文献着手的工作，在当时无疑是开拓性的。²²《辑要》可以说是第一部不靠英国蓝皮书等外国文件编印的外交史资料，李敖后来将此工作与胡适为中国哲学史“开山”相提并论，称蒋廷黻为“替中国外交史导航的人”。²³对于正从事整理近史长编的郭廷以来说，与蒋结识，确有如遇知音之感。有过一同工作的经验，在方法、观念上受后者熏陶，更加坚定“历史研究应自史料入手”的研究路数。可以说，蒋廷黻设计了近代史的框架，却未及对近代史发展过程做具体研究，郭廷以则对近代史下了全面的工夫，并实实在在推进史料的整理。

四、“史事日志”编纂始末

大约自东南大学的二年级，郭廷以开始学做读书笔记。由于近代史研究留有大片空白，无从依傍，他就从最基础的史料工作入手，做编年整理，从而完成最初的史学训练。往后渐渐将札记范围扩充至记录时事方面，北洋军阀内战时期军事繁兴，郭廷以据能接触到的资料，随时记录内阁变迁、各省军队番号、驻防区变更、军官出身等等，并列出表格，这些工作成为“后来研究现代史的准备”，可见其已有保存当代史料的自觉。²⁴

大学毕业后，郭廷以就职于国民革命军政治部，时值北伐战争发动，他以史家的敏感意识到这是一件“大事”，根据报刊逐日记“大事志”。他所在的政治部下属编史局，专门收集国民革命军史料，因此有条件写作“日志”，为将来撰写军史做预备。郭廷以有过史料学的训练，在搜集当代资料方面非常用心，据他自述：“当时我收集资料的范围很广，标语也加

¹⁹ 《郭廷以口述自传》，第140页。

²⁰ 《蒋廷黻回忆录》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2003年，第132—135页。

²¹ 《郭廷以口述自传》，第140—141页。

²² 参看沈渭滨：《蒋廷黻〈中国近代史〉导读——兼论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》，收入蒋廷黻：《中国近代史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1页。

²³ 李敖：《蒋廷黻和他走的路》，台北：远流出版公司，1986年，第8页。

²⁴ 《郭廷以口述自传》，北京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09页。

以收藏，并记载了某年某月在某地某个机构贴出来的标语，由此很可发现军政方面变化的迹象。”²⁵民国大事志范围渐渐前推，“把清末至最近的近代史大事写出一个大概，对研究近代史有了一个骨架了”。1928年春，《清季史事日志初稿》由中央政治学校印行。²⁶其后，在北京、南京各地任教期间，郭廷以利用清华大学、燕京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北平图书馆、金陵大学、中央大学、南京国学图书馆等处藏书，对手头已初具规模的“近代中国史长编”不断加以补充，随着资料搜集范围的扩大，内容也得以充实和细化，覆盖的时间段上自十六世纪中西关系，迄至民国20年代。他选出其中相对成熟的部分，以《太平天国历法考订》、《太平天国大事日志》独立成书，出版后轰动一时，郭廷以也由此奠立与简又文、罗尔纲鼎足而三的“太平天国史先驱大师”地位。²⁷

至迟不晚于1939年，《近代中国史事日志》写作已基本完成，并由中央大学制成排印本，但郭廷以精益求精，不愿匆忙定稿，加之抗战军兴，辗转耽搁，一直到60年代，即台湾近史所时期才正式出版。当时《中华民国史事日志》也已初具规模，郭廷以的多位弟子张朋园、吕实强、陆宝千、陈存恭等人对内容增补均有所贡献，而最终定稿是他晚年在纽约完成的。在生命最后一段时光，郭廷以仍旧保持着数十年前初操史觚时的工作热情，在美国各大学及国会图书馆搜集资料，逐日逐条加以增订，“到死还是没放弃”。该书出版经历了波折，张朋园后回忆说：“郭先生去世十年后，近史所才在所长吕实强的主持下，出版郭先生的《中华民国史事日志》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几乎都认为郭先生这套书没希望出版了，因为那个时代，没有人敢批评政治，不像现在，就算你不喜欢总统也可以批评他，但在当时，你只有生闷气的份。”²⁸无论如何，多种史志终得以汇齐出版，总算是对郭先生身后的告慰。

五、从《近代中国史》到《近代中国史纲》

今日流传最广的郭著《近代中国史纲》完成于上世纪70年代，而再提前30年，即郭廷以与罗家伦、蒋廷黻共事清华大学时，已酝酿此书的最初胚胎。当时罗、蒋计划合撰近代史一书，郭廷以也答应参加。²⁹前两者后皆由学入政，无暇及此，唯郭坚守本业，始终不懈，愈老弥坚，数十年固执近代史研究本分。从形式上看，最终成书的《近代中国史纲》近似一种“简略的通识读本”，但它的写作实际上经过长期的准备，可谓郭廷以“一生学力识力简化表达的一个成品”。³⁰较少为人所知的是，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，郭廷以就出版过两大册以《近代中国史》为标题的著作（长沙：商务印书馆，1940、1941年）。这两册各达600多页的大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近代通史，而是分别以早期中外关系、鸦片战争为主题，着力于“史料之整辑排比”的文献集成。1931年，罗家伦发表《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》一文，就“科学的近代史”研究宗旨、方法及范围提纲挈领，直言“现在动手写中国近代史，还不到时候”，“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——无论起于任何时代——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”。³¹这实际上为当时研究“限定范围”。此文作为“引论”，收入郭撰《近代中国史》第一册，同书“例言”说：“历史研究应自史料入手。以近代中国史论，现在尚为史料整理编订时期，而非史书写著时期”。在史料取舍上，也严格按照罗家伦所论以“原料”为尚，必不得已，始一用副料”。郭廷以原计划按鸦片战争、自强运动、中日战争、戊戌变

²⁵ 《郭廷以口述自传》，第112、123页。

²⁶ 《郭廷以口述自传》，第125页。

²⁷ 《王尔敏先生访问记录》，《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》，第173页。

²⁸ 《张朋园先生访问记录》，《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》，第260页。

²⁹ 郭廷以：《近代中国史纲·小记》，香港：中文大学出版社，1979年。

³⁰ 《王尔敏先生访问记录》，《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》，第173页。

³¹ 罗家伦：《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》，《近代中国史》第一册，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79年第五版，第11页。

法等大事件分若干主题，写一部完整近代史，并雄心勃勃地拟议了总计 19 卷的庞大著述计划，但随着抗战军兴，辗转迁徙，客观上失去了专心研究的条件，《近代中国史》只出版了前两册，便无以为继了。³²

郭廷以的主要著述，尤其多部带有干燥的、实证气味的“史事日志”易造成一种刻板形象，让人以为他只是一个会写史事编年的“史匠”。其实在写作《近代中国史》时，除对相关史料“整辑排比”外，他就特别注意使分立不同的记载“互相联通”，为读者获得“一贯明了之认识”，各主题下均附以简要解说，并“酌采西籍，并使其自成体系”；不过强调仍属研究初步，目的只“为后来史家做下若干预备工作”，故行文时“决不轻加论断，妄敢评议”。张朋园以今日眼光视两册《近代中国史》，认为其中“不只是史料，还有郭先生对史料的独特见解，并非没有解释”，他进而指出，这一“历史需要解释的观念”是由蒋廷黻所种下的。³³郭廷以的同辈人顾颉刚在评论《近代中国史》时，也称作者观念“与蒋先生一样，其书搜辑精详，考证完备”。³⁴

郭廷以到台湾后，在近史所培养的早期弟子，即所谓“第二代中坚主体”的研究多集中在 19 世纪，每人分别各就一两阶段进行专题研究，待有相当成果即出版专刊。某种意义上也可谓在《近代中国史》一二册之后，“追上去补撰其下的各册”。³⁵郭廷以晚年撰写《近代中国史纲》，引用了不少近史所同仁的研究成果，也吸取了美国学者费正清、韦慕庭等人的意见，再灌注以自身数十年浸淫中国近代史的心得，自成一说，可谓集大成的著作。《近代中国史》、《近代中国史纲》二书，出版一前一后，内容一详一略，形式上适成对比，而创作内涵则一脉相承，表现郭廷以史学的特色也有互通处。

六、中西“交通”的观念激荡

蒋廷黻的研究是从外交史拓展到整个近代史领域的，郭廷以对近代中外关系也始终保持特别的兴趣。他在大学里专门开过西域史、中西交通史课程，认为不同文化都有其特点，亦有其相通之处；历史不仅在时间上有连续性，在空间上也有其交互性，所谓“六合为一国，四海为一家”。这一重视中西“交通”的观念也渗入到他对近代史的观察中，《中国近代史》整体构思就依照一个非常明显的框架，即西力冲击是中国近代史的重心。王聿均对郭廷以课堂讲授的中外关系史印象至深，了解到文化的“横的移植”和“纵的继承”是何等重要，自喻宛如“蓦然张开了心灵之眼”。³⁶

郭廷以这样一种重视中西“交通”的观念也渗入到他对近代历史的观察中。《中国近代史》第一册整体的构思就依照一个非常明显的框架：西力冲击是中国近代史的重心。其章节顺序为：第一章，中西陆上的接触；俄人东进；第二章，中西海上的接触；海道大通；第三章，中英关系；第四章，通商概况；第五章，中外纠纷。张朋园将之与费正清后来出版的名著《中国通商口岸之开启及外交》24 个章节作对比，结论为“大同小异”。作为“冲击—回应”模式的代表人物，费正清的重要观点是中国在西力冲击下扮演了“消极”的角色，缺乏正确对策，所以遭致挫败；郭廷以的观点与之近似，所不同处，前者说中国没有做出适当的

³² 第一册 1935 年交商务印书馆出版，后索回原稿再予补充，1937 年再交与商务，排版完毕正要印刷，抗战发生，商务印书馆被炸毁，幸运的是另外保存了一份书稿复印件，至 1939 年商务在香港复业，打清样寄至重庆，由郭廷以重新修订审查，再寄香港付印。不巧又逢太平洋战争爆发，以为出版无望。实际上已经印出，至战后运回上海发行。（《郭廷以口述自传》，第 146—147 页）

³³ 张朋园：《郭廷以、费正清、韦慕庭——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》，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1997 年，第 108 页。

³⁴ 顾颉刚：《当代中国史学》，沈阳：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8 年，第 76 页。

³⁵ 《王尔敏先生访问记录》，《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》，第 173 页。

³⁶ 《王聿均先生访问记录》，《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》，第 23 页。

“回应”(response),后者则谓没有良好的“适应”(adaptation),两者间没有直接关系,但共同受到蒋廷黻的影响则显而易见。³⁷

郭廷以到台湾后,写作了一系列专题论文,集中讨论近代中外关系、中国与世变、西洋文化的输入及其反响等问题。作于1950年的《中国近代化的延误——兼论早期中英关系的性质》一文写道:

“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,均可以说是一部生存竞争的历史。竞争过程的顺逆和结果的成败,决定这个国家民族的祸福命运。顺逆成败,则又决之于国家民族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能力,亦就是决之于近代化的程度。要能适应环境或近代化,首须对于环境与时代具有正确的认识,否则就无从谈起。”³⁸

此阶段论述仍延续了他对中西“交通”的思考,并据国家民族对于时代环境的“适应”能揭示“近代化”的内涵,而其“近代化史观”也渐渐清晰和成型。如果我们注意到上世纪70年代近史所全面推动的“中国区域现代化”研究,实际上正是郭廷以“近代化”研究思路的延伸。这一项规模庞大的集体研究,并未以理论作为标榜,但却是当时风靡中外的所谓“现代化研究”中少数以实证方法取得扎实成果的代表。

郭廷以本人对郭嵩焘、曾继泽、薛福成这些较快对西方做出“适应”的近代人物推崇备至。《郭嵩焘先生年谱》是他生平著述中唯一一部年谱,而这部作品实际是在蒋廷黻的提议和督促下完成的。抗战初期,蒋在重庆就表示“我的两位同乡郭嵩焘和曾纪泽的传记,最值得撰写”,希望郭能身任其事。上世纪50年代,二人在纽约重逢,蒋又旧事重提,建议“不妨先抽空来写一部郭嵩焘年谱长编”。³⁹一直来,郭对谱主也“同样钦敬,同具兴趣”,他与多位弟子合撰《年谱》,几经周折,最终在1971年出版。⁴⁰当时蒋廷黻已辞世多年,一部年谱,由几代学人接力完成,也见证了近代史研究进步的一个侧面。

七、远于主流的“通识”意识

一般印象中,郭廷以是一位专业的近代史研究学者,其实除长期主讲中国近代史外,他在河南大学、中央大学、台湾师范大学等校还开设过元明史、明清史、民国史、中西交通史等多门课程,学生评价他“元代以下的历史根基都很深”。⁴¹上世纪40年代,郭廷以曾计划撰写一部教科书性质的《中国通史》,在这部草成而未出版的“通史”著作中,他自言“读史记忆固属重要,思想启发亦须注意,本书即系两者并重”,尤其强调“通变”的意义。⁴²前述19册《近代中国史》著述计划,虽中途腰斩,却包含有完整的通篇思考;至于后期出版的三种专书,《台湾史事概说》、《俄帝侵略中国通史》和《近代中国史纲》均为通史性质,足称“融会贯通的成熟之作”。王尔敏总结其师史学特色,“既是长于年代学,宗旨乃是建立史学通识”。他还提出很有意思的命题:“初期之中国近代史研究,普遍不循主流学风之考证、考异、辨伪、订误、质疑、翻案等手法,……蒋廷黻、郭廷以则以治重大问题为宗,远离30年代主流风气。”⁴³

³⁷ 参看张朋园:《郭廷以、费正清、韦慕庭——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》,第108—109页。

³⁸ 郭廷以:《中国近代化的延误——兼论早期中英关系的性质》,原刊《大陆杂志》1卷2期,1950年7月,收入《近代中国的变局》,台北:联经出版事业公司,1987年,第1页。

³⁹ 郭廷以编定、尹仲容创稿、陆宝千补辑:《郭嵩焘先生年谱》,台北: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,1971年,序,第1页。

⁴⁰ 陆宝千:《我和量宇师的铎瑟因缘——前缘后分皆如水》,《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回忆录》,第552—553页。

⁴¹ 《王聿均先生访问记录》、《李国祁先生访问记录》、《贺忠儒先生访问记录》,《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回忆录》,第19、141、413页。

⁴² 郭廷以:《〈中国通史〉引论》,《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》,第45页。

⁴³ 王尔敏:《南港学派之史学宗风及其学术成就》,《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》,第219页。

这里所谓“主流风气”，集中体现在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到傅斯年领导的中研院史语所一线，即作为史学科学化代表的“新考据学派”，也是今日研究者在梳理上世纪史学发展史时再三致意的对象。⁴⁴以方法为重的“科学史学”，特别强调专业化和专科化，那种问题取向的、窄而深的研究，与传统学者一再强调的中国贵通人不贵专家的观念格格不入。⁴⁵虽然南北学风存有异议，上述新派史学不乏为数众多的批评者，但就其掌握的学术资源及影响力所及而言，确实不可不谓为“主流”。20年代30年代，北平学术界里充满着“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”的空气，各大学史学课程日趋专门化，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的蒋廷黻却对这种学术风气有自觉反拨。他着手学科建设，名为考据与综合并重，实则偏向于为综合史学鸣锣开道。⁴⁶清华出身的何炳棣回忆说，在30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历史系才是“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，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，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”，“这种社会科学、中西历史、考证综合、兼容并包的政策，七七抗战前夕已初见成效，若无战争干扰和意识形态断裂，理应会于20世纪后半结出累累果实的”。⁴⁷郭廷以与蒋廷黻共事清华，对历史宏观理解多所共鸣。蒋在抗战期间写出大纲性的《中国近代史》，郭对这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始终备极推崇，认为“具有分析度，文笔流畅，读起来非常有启发性”；历时多年、坚持不懈地编纂多部史事日志，无疑是为通史写作奠定基础；最后完成《近代中国史纲》，其实也在追步先贤，寻求一种对近代史的贯通理解。

另外，不像蒋廷黻具有海外留学的背景，可为史学方法论提供来自“西方”的奥援，郭廷以在国内完成教育，他所毕业及后来长期服务的院校，更是在学风上与北京大学及中研院史语所等新史学重镇遥相对立。“南高学派”独特的治学取向，体现在以柳诒徵为领袖的一批文史学者对“科学史学”所持批判立场中，他们不满于唯考据是尚而不能兼顾义理的学风，坚持不应为追逐史料而迷失整体。已如前述，在读课外书及研究近代史的兴趣方面，郭廷以受柳诒徵影响很大，其不满者仅在柳轻视考证，对重视贯通理解、追寻历史规律性的努力，并无太多异议。郭自认为他的史学方法主要得益于历史系主任徐养秋，“严格讲起来柳先生教我看书，徐先生教我方法”，而后的治学特色恰在于强调综合、比较，富有宏观视野。他回忆说，“徐师精通西洋历史及研究方法，中国学问也有根基，善于用中国的历史作例证来解释西洋的新史学方法，教起来融会贯通，使人倾服”。⁴⁸

《近代中国史》第一册成书时，郭廷以对自己的师承直言不讳：“编者研习史学，柳翼谋（诒徵）、徐养秋（则陵）两先生首启发之，而专力于近代中国历史，则实受罗志希先生之教诲，本书之编辑，所得罗先生之指导协助尤多。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学科研究，实与罗先生同开其风气，直接间接，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。回顾郭廷以在30、40年代的史学活动，虽然难说“与当代流行学风无所瓜葛，方法宗旨各不相干”，但距离“科学史学”的主流确所稍显迂远，更与后来渐成气候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毫无渊源，以致被后世史学史著者有意无意忽视，其中委曲也就不难理解。至于他在台湾草创近史所，进而培育成一南港学派，真正称得上“自具源流，自辟进境”，而领导人较显特殊的教育背景和治学取向，也成为近史所与史语所之间产生持续紧张的远因。联系到郭廷以后来遭人攻讦，以致远走美国，中间也不无潜在脉络可寻。这些问题已经超出本文论旨，姑且留待高明处置

⁴⁴ 许冠三：《新史学九十年·自序》上册，香港：中文大学1986年；王晴佳：

⁴⁵ 王汎森：《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》，《20世纪的学术与社会·史学卷》，第73页。此就主流趋势而言，具体到学者个人，在史料观与历史解释，乃至建立民族认同之间，情况又复杂得多。参看[德]施耐德：《傅斯年、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。

⁴⁶ 桑兵：《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81—82页。

⁴⁷ 何炳棣：《读史阅世六十年》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，第73页。

⁴⁸ 《郭廷以口述自传》，第94—95页。

八、结语

余英时曾以易卦之“既济”、“未既”取譬，谈到专门研究领域发展，前者以“大师”（或其学说）为中心，较带封闭性，后者则以“学”为中心，更具开放性。他认为郭廷以创办近史所便是后者的代表，“近史所的多元化发展和成绩斐然，饮水思源，不能不归功于创始者的胸襟器识。”⁴⁹著名美国史学家魏裴德一度陷于无边无涯的汉学传统无力自拔，无法为自己的事业准确定位，他将重建自信的关键，归功于“郭廷以的开创性伟业的启迪”，亦即把近代史视作一个独立自存的研究领域，他得以勇于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汉学家，而不过是“一个有着一定的概括能力、同时又有着东亚地区某些研究知识的中国近代史家”。⁵⁰郭门大弟子唐德刚治学旨趣与乃师迥异，而在晚年时动情回忆道：“他是我做 research 的启蒙老师，也是我平生为老师送葬的唯一的一个人”。⁵¹刘敬坤出自郭廷以在中央大学历史系所教的最后一班，也是他为数不多的留在大陆从事史学工作的学生之一。他在 2003 年接受访问时，谈到其师著述最大特点就是“忠于历史，不带政治色彩，事实就是事实，绝不能扭曲”，他承认“郭先生是真正的近代史的开辟者”，不过也遗憾地表示：“目前在大陆，有几个人走郭廷以的学术路线，但却不是郭先生教的”。⁵²

在学生们眼里，身材瘦高的郭廷以体格并不很强壮，经常穿着长袍，不苟言笑，声音低沉，口才并不算佳，——“永远是一副扑克牌的面孔”。这位曾经令人生畏生敬的老师、毕生倾力于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的“郭夫子”，已经离世近三十载了，而他留给我们的史学遗产仍然历久弥新。

作者简介：戴海斌（1978—），男，浙江省绍兴市人，历史学博士，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，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外交史研究。

近期发表目录：

《庚子事变时期张之洞的对日外交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10 年第 4 期

《“东南互保”之另面——1900 年英军登陆上海事件考释》，《史林》2010 年第 4 期

《庚子年张之洞对日关系的若干侧面——兼论所谓张之洞的“帝王梦”》，《学术月刊》2010 年第 11 期

《“题外作文、度外举事”与“借资鄂帅”背后——陈三立与梁鼎芬庚子密札补证》，《近代史研究》2011 年第 2 期

通讯地址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近代史研究室 中国上海中山西路 1610 号 200235

Email: haibin112@sina.com **Mob.:** 15821208682

⁴⁹ 张朋园：《郭廷以、费正清、韦慕庭——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》，余英时序。

⁵⁰ 魏裴德：《遨游史海：向导师郭廷以致敬》，《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》，第 578—579 页。

⁵¹ 唐德刚：《教我做 research 的启蒙老师——纪念业师郭廷以教授二十周年》，载《走过忧患的岁月——近史所的故事》，第 25 页。

⁵² 《刘敬坤先生访问记录》，《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》，第 462—463 页。刘敬坤（1923—2009），安徽霍邱人，1945 年入中央大学历史系，1949 年毕业。50 年代初执教于南京大学历史系。1981 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，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。身受双重史学传统熏染的刘敬坤先生在不同场合，分别接受过海峡两岸学者的访谈，就中国近代史研究传统和趋势发表自己的看法，颇具参考价值。另参《刘敬坤先生访谈录》，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：《回望一甲子——近代史研究所老专家访谈及回忆》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0 年。